

後民族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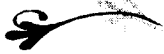
哈伯瑪斯
政治論文集

○ 哈伯瑪斯 著
曹衛東 譯

現
代
名
著
譯
叢



現代名著譯叢



後民族格局

——哈伯瑪斯政治論文集——

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Politische Essays



Jürgen Habermas ◎ 著

曹衛東 ◎ 譯

現代名著譯叢

後民族格局：哈伯瑪斯政治論文集

2002年7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Jürgen Habermas
譯者	曹衛東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責任編輯 張怡菁
方清河
封面設計 陳枝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80-1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8

前言

對於新的跨界格局而言，「變動與界限」(Fluß und Grenze)是一幅很有誘惑力的圖景。1846年，在法蘭克福召開日爾曼語言文學家大會，會議主要是為了明確民族的界限，可是到了今天，民族的界限卻處於變動之中。本書前兩篇主打文章就是要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來闡明我們的民族語境。當時，共和主義的視角才剛剛萌發。今天，我們卻在冷靜地審視其災難性的終結¹。

¹ 本書沒有收入拙文“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in K. D. Bredthauer, A. Heinrich (Hg.),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Bonn, 1997), 14-37. 這是一篇涉及到戈德哈根的爭論文章，之所以沒有收入，倒不是因為我固執己見。我絲毫不懷疑批判戈德哈根的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準確理解。但我感到遺憾的是，文章標題所揭示的論題沒有引起深入的爭論，我所說的是歷史在公共應用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分化。我們如果不區分清楚對於傷害人權和大眾犯罪的道德立場、法學立場以及政治-倫理的自我理解(它們都是在民族架構內醞釀起來並展示出來的，也受到其他人的被動支持或寬容)，那麼，歷史的公用就會墮落為煽動性的歷史政治。從這個角度來看，戈德哈根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哲學意義。他使用了一種解釋架構，使得他能夠把行為自由的道德維度用來對直接的兇手做歷史分析。我們假定，一個行為者如果對行為的可能性有著一定的認識，因而能夠承擔起行為的責任，並且可以從自己的視角出發作出規範的論證，那麼，我們就說他享有所謂的「自由」。

對短暫的20世紀進行回顧和診斷，目的是想澄清當下充滿絕望的氛圍。藉由回顧，我們可以更好地關注下個世紀面臨的棘手問題：社會福利國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況下能否得到堅持和發展？〈後民族格局與民主的未來〉一文追溯了選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治路線，但對超越新自由主義和老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這套修辭不抱任何信任²。

隨著歐洲的貨幣政策開始統合，我們注意到聯盟有回轉的趨勢。滿足於市場統合的歐洲人與從民族國家的觀念出發對歐元持懷疑態度的人攜起手來，想一同使歐洲僅僅停留在經濟一體化的層次上，並讓歐洲在政治上永遠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這樣做所要付出的代價預計就是社會發生扭曲，而這樣的代價按照今天的文明標準來衡量不僅是昂貴，甚至是太過昂貴了。沒有社會正義，也就不會有民主的正當性。這是一種保守主義的基本原則。人們對超越左派右派的烏托邦設計應當保持懷疑的態度，但在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似乎存在著角色互換的可能性。因為，所謂「革命」，就是要打消人們對於平等的普遍主義標準的追求，把社會不平等歸結為「成功者」和「失敗者」所具有的自然特性。

不過，在民族的脈絡內，政治越來越難以與全球化的競爭保持同步。我認為，一種規範性的選擇只能是使歐盟實現聯邦制（歐盟本來就在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上具有了一定的活動空

² 本文是和Gerhard Schröder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文化論壇（1998年6月5日）上的對話稿。

間)，這樣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突破；然後，我們才可以去考慮在未來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秩序，既保持著差異性，又實現了社會均衡。歐洲致力於消滅任何一種暴力，包括社會暴力和文化暴力，這樣的一個歐洲將不會受到後殖民主義的侵蝕，因而也不會倒退到歐洲中心主義。在人權的文化間性話語當中，也會保持一種充分去中心化的視角。

第三部分的文章概略地回顧了我在主要部分分析後民族格局的挑戰所立足的哲學背景。現代性的自我理解當中也包含著一個自主(自律)的概念。這個自主(自律)概念是反對重新討論複製人體器官的一個論據。

J. Habermas

目次

前言	i
第一部分 民族語境	1
何謂民族	3
I. 雙重目的 / II. 早期精神科學的世界觀 / III. 內分與外別 的辯證法 / IV. 從民族精神的民族到國家公民的民族 / V. 德國與文學的非政治的自我理解	
論歷史的公用	35
第二部分 後民族格局	49
災難與教訓——短暫的20世紀：回顧與診斷	51
I. 永恆的連續性 / II. 20世紀的兩大特徵 / III. 社會福利國 家妥協的終結 / IV. 超越民族國家？	
後民族格局與民主的未來	73
論人權的正當化	141
I. 民主法治國家的程序性證成 / II. 西方的自我批判 / III. 他者的話語：「亞洲價值」 / IV. 原教旨主義的挑戰	

第三部分 現代性的自我理解	161
現代性的概念——兩個傳統的回顧	163
哲學與政治的不合拍——紀念馬庫色百歲誕辰	197
第四部分 反「複製人」的論據	205
遺傳學的奴役統治——複製醫學進步的道德界限	207
不是自然阻止複製，而是我們自己必須做出決定	211
「複製人」不是民事案件	217
參考文獻	221

第一部分

民族語境

何謂民族？

——三月前革命時期精神科學中的政治自我理解：
以1846年日耳曼語言文學家法蘭克福大會為例 *

I. 雙重目的

無論是在「法蘭克福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邀請函當中，還是在《日耳曼語言文學家議案》(*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¹ 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舉辦者心存雙重目的。在杜賓根法學家萊舍爾(Reyscher)的發起下，一批著名學者，如格林兄弟(Jacob und Wilhelm Grimm)、格維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蘭克(Leopold Ranke)、烏蘭德(Ludwig Uhland)、達爾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貝塞勒(Georg Beseler)、米特邁爾(Karl Mittermaier)等，共同創建了一個學會，致力於把

* 本文是在法蘭克福大學一次集會上的演講稿。

1 *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 J. D. Sauerländers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1847).

德國法學、德國歷史學以及德國語言學這三門學科打通研究。學會的首要目的在於為學術交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因為，在此之前，學者除了閱讀雜誌和書籍之外，相互之間基本上都是一些私人關係，信件來往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不僅法學家、歷史學家以及語言學家之間跨學科的交往是如此，各個學科內部，哪怕是日耳曼語言文學之間的交往也同樣如此。於是，就有必要建立一種比較穩定的交往形式，以便加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和學習——「自由發言，自由討論」，而且不允許「念稿子」。這種形式脫胎於1822年的全德自然學者和醫生的學術大會以及1838年的古典語文學家大會。當然，發起人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全德人文學者大會將會被看作是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事件。

第二個目的超出了學科的要求，是一種政治目的，主要是為了結束祖國的四分五裂的狀態，實現祖國的統一：「如果要求我們直接干預生活，對於一次學者聚會來說未免期望過高；但是，這次會議無疑是立足於學術研究，尊重時代的價值性和嚴肅性，而且每一個人都充滿了鼓舞全體民眾的激情，因此，我們敢說我們的會議所取得的成績不容低估。」² 會議的日程安排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作為後來者，我們在職業和生活當中自覺與精神科學以及我們國家的共和主義保持著緊密的關聯，今天，我們再來閱讀這次會議的有關記錄，還會深切地感受到打動與會者的動力之所在。當然，回顧歷史，我們從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那裡也能發現一些非政治的因素。但不管如何批

2 *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 6.

判，沒有誰不會被這種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開端所吸引。學者們對其對象(即「日耳曼民族的古典文獻」)的探討，與當時的政治趨勢是息息相關的。

這次學術活動還是充滿了悲劇性的反諷意味。因為，人們歡呼雀躍的開端，其實是一次終結：在政治意義上是這樣，在學術史意義上也是這樣。1846/47年在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和呂貝克(Luebeck)召開的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它試圖把構成早期精神科學核心內容的各個學科綜合起來。5年後，德國的法學家和語文學家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組織，而且合乎科學學科分化的規範模式。

從18世紀末開始，除了已經確立起來的古典語文學和古典藝術史之外，其他的精神科學學科也都建立起來了。但是，由於它們都主張一種歷史主義的觀念，因此，它們相互之間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因而還不能形成一種完善的學術氛圍。到了1840年代，也就是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召開的時候，精神科學學科的形成階段宣告結束了。參與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的只有四位被精神科學史家羅特哈克爾(Erich Rothacker)列為奠基者，即格林兄弟、蘭克和維爾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他們似乎是最後幾位能夠進入以下傑出學者行列的人物。這裡所說的傑出學者主要包括：赫德(Herder)、默澤爾(Möser)、沃爾夫(Wolf)、施萊格爾兄弟(Friedrich und August Wilhelm Schlegel)、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洪堡德(Humboldt)、尼布林(Niebuhr)、薩維尼(Savigny)、艾希霍恩(Eichhorn)、克羅伊策(Creuzer)、格雷斯(Görres)、博普(Bopp)以及伯克

(Boeckh)等³。在開始的時候，各個學科還使用相同的語言，羅特哈克爾引用了兩段著名的話來形容1774到1854這80年的發展過程：「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內在核心，就像任意一個球都有重心一樣。」(赫德)「每一個時代都直接面對著上帝，時代價值的基礎根本就不是時代的產物，而是時代的實存。」(蘭克)法蘭克福大會試圖掀開科學歷史的新篇章，實際效果卻使開端走向終結。從科學史來看，法蘭克福大會也是對名稱的轉換⁴。此時，雅可布·格林從語言科學的角度提出了「日耳曼語言文學家」(Germanisten)這樣一種榮耀的稱號，而在當時，這一稱號一般已不再用於法學家，而是專門針對現代語文學家。

同樣被證明是幻覺的，還有日耳曼語言文學家的角色，他們以為他們在政治公共領域當中能夠扮演民族精神的當然解釋者。眾所周知，兩年之後，就在這次會議附近的保羅教堂(Paulskirche)，人們試圖把德國建構成爲一個統一的自由主義憲政國家，但卻未能取得成功。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的代表當中大約有10%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國民大會，他們當中的多數還是核心成員。所以，威廉·施雷爾(Wilhelm Scherer)才會把這次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稱爲「法蘭克福議會的前奏」⁵。「三月

3 E. Rothacher, *Logik 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Bonn, 1948), 116.

4 U. Mewes, "Zur Namengebung 'Germanistentage'," in J. Fohrmann, W. Voßkamp,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Weimar, 1994), 25-47.

5 J. J. Müller, "Die ersten Germanistentage," in *Literatur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2 (Stuttgart, 1974), 297-318.

前革命時期」(Vormärz)是第一個階段，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在這個時期，精神科學的領袖人物都志在發揮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和公民所具有的職業知識的公用。當這樣一種嘗試擺在政治知識分子面前的時候，我的師輩，不管是在1933年之前、期間還是之後，顯然都沒有表現出他們作為公民的積極性。知識分子的作用依靠的是自由主義的公共領域和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150年前，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在法蘭克福的凱撒大廳(Kaisersaal)呼籲新聞自由，他們當時對此是有著清楚意識的。但我們不敢斷定諸如佩特森(Julius Petersen)、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貝爾特拉姆(Ernst Bertram)、瑙曼(Hans Naumann)或羅特哈克爾(Erich Rothacker)這樣的思想家也有同樣的意識。

保羅教堂運動的失敗是有其客觀歷史原因的，這一點我不想詳細討論。但日耳曼語言文學家作為這次運動的一個組成力量，他們的失敗則不僅僅是由於歷史原因。構成障礙的還有作為早期精神科學的哲學當中所反映出來的政治的自我理解。他們的失敗之處，不僅僅在於未能成功地逾越學科的界限。他們所遇到的問題還包括對於未來的潛在建構，這使得他們誤以為自己的民族已經成熟。我想根據雅可布·格林的觀點，簡要地描述一下歷史學派的哲學背景(2)；然後，我想根據他們討論當中出現的矛盾，闡明面向未來的民族精神觀念是如何使自由主義的精神陷入困境的(3)；格維努斯(Gervinus)迴避了由於民族精神學說的歷史動力所帶來的內分(Eingrenzung)和外別(Ausgrenzung)的辯證法。當時，只有像弗勒貝爾(Julius Fröbel)這樣的民主主義者才能透徹地揭示出文化意義上的「民族」

(Volk)與公民組成的「民族」(Nation)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他們恰恰沒有出席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4)。日耳曼語言文學所作的第一次傑出的努力，就是要介入共和主義的公共領域，後來他們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努力。最後，我想指出的是，日耳曼語言文學得出非政治的自我理解是有其學科自身內部的原因的(5)。

II. 早期精神科學的世界觀

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主持了第二次全體會議，主要討論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之間的關係。在雅可布·格林看來，化學和物理學是建立在計算基礎上的精確科學的典範，它們把自然當作一架機器，並分解為不同的組成要素，用它們來實現新的技術目的。「非精確」科學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於感官心靈結構異常精巧(「一種特別的個性裝置」)，它們深入到了多元的有機體和人的內在歷史結構當中。它們不是表現為「令人震驚和恐怖的槓桿和發明」，而是表現為內在價值，表現為物件的尊嚴：「語言、詩歌、法律和歷史當中的人性內容，比動物、植物和化學元素離我們的心靈要近得多。」然後，格林出人意外地轉向了軍事，他補充說道：「用這些武器，一個民族可以戰勝外來者」⁶。

雅可布·格林作出這樣的圓型表述，是出於認為，從事觀

6 *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 62.

察和說明的自然科學所把握的是一般現象和合乎規律的關係，而理解型的精神科學探討的則是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物件的個體性。雅可布·格林關注的不僅僅是一般與特殊、「計算科學」和「表意科學」之間的對立關係（這是文德爾班後來所使用的概念的），他還涉獵到了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對立關係。詮釋學對於理解的前判斷結構的認識主要在於，我們比他者能更好地理解自身，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一點首先表現在詩歌當中，「詩歌實際上只能用母語來理解」。日耳曼民族的古代文物也是這樣。記載著民族精神的這些古典文獻對於今天的人來講充滿了魔力，要想深入理解它們，我們就不能依靠任何中立的科學研究，而必須全身心地投入進去。理解者把他的主體性貫徹在認識過程當中，目的是要滿懷熱情地從他者身上重新發現自我。詮釋學的理解似乎離不開攫取和佔有的激情：「只要有火，就能把鍋煮沸；任何一種被冠以拉丁語名字的新植物，只要氣候允許，我們就希望它在所有的地方都能茂盛地生長；但我們喜歡的卻不是什麼外來詞，而是歷史上被湮沒了的德語辭彙，因為我們可以把這些辭彙重新拿過來使用，我們認為，祖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發現對於我們的祖國都將是大有裨益的。」⁷對於雅可布·格林來說，科學交流的包容特徵僅僅源於自然科學的冷漠的普遍主義：「精確科學適用於整個世界，但它們無法把握心靈」⁸。相反，精神科學浸淫在各種文化的深層

⁷ *Ibid.*, 60.

⁸ *Ibid.*